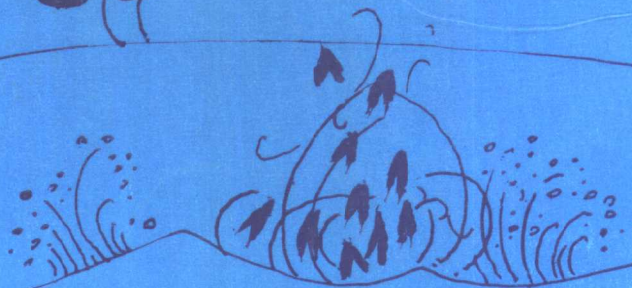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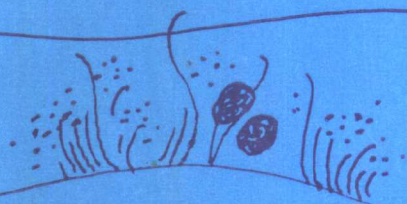


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

日本文化特征

〔日〕加藤周一 木下顺二 等著
唐月梅 吕莉 译



日本文化特征

〔日〕加藤周一 木下顺二 等著

唐月梅 吕莉 等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日本文化特征

〔日〕加藤周一 木下顺二等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125印张 112 000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 S B N 7—206—01576—X

G·302 定价：3.00元

《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总序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实现了现代化，其成功的主要经验是最终避免了“全盘西化”和“全盘国粹化”，使其文化传统的创造主体，在现代化中起着动力机制的作用、在实践中确立了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即“民主主义原则、技术文明和日本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形式。”（加藤周一语）也就是说，以民主主义为基础，以高度技术文明为手段，以日本文化传统作为根本。简言之，就是大文化起着主导的作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各异，但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本国文化传统，建立与西方文化“对立·融合文化模式”，并发挥着创造的主体作用，也许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因此，我们特邀日本著名学者、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渭渠先生、副研究员唐月梅先生合作主编《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以供读者思考、研究日本之经验，努力探索我国现代化的模式，使我国早日实现现代化。

本丛书的出版，承蒙加藤周一先生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以及叶渭渠、唐月梅两先生的通力合作，在此一并鸣谢。

编者

目 次

总序

- 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加藤周一 (1)
- 日本文学的特征……………加藤周一 (20)
- 美的存在与发现……………川端康成 (52)
- 日本文学之美……………川端康成 (78)
- 复式梦幻能……………木下顺二 (89)
- 原型・古层・执拗的低音
- 关于日本思想史方法论的探索……………丸山真男 (112)

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

加藤周一

人们一直认为，日本的文化与社会，或者说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和基于其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日本人的意识结构，与中国及西方、有时与其他社会进行比较，就具有某些特征。的确，有些现象，别的国家没有，唯独日本才有。譬如，地铁站里广播说：“关车门了，请注意别挟手。”按理说，车门只要没有故障，照例是要关上的。如果在日本以外的社会，只有在不关车门的时候才广播提醒人们注意，而关车门的时候就不会一次次地广播了。更何况提醒人们小心别挟手这类话，大概只限于大人对去郊游的幼儿园孩子才说的吧。再譬如，在政治方面，明治以后的天皇制也是独特的。天皇拥有最高的权威，却没有实权。既是万事的负责人，却对任何事又没有责任。这种模式通用于社会各层次的各种组织。虽然这样好歹可以指出若干日本的社会文化特征，但从什么观点出发才能统一地去理解它呢？什么样的特征才是最基本的，并由此而导出其他特征呢？为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理解，应以什么样的范例、什么样的原理才能说明具备所列举的各种特征的日本社会和文化呢？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探讨的问题。

于是，我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第一是竞争性的集团主

义问题。竞争在集团与集团之间，或一集团内部成员相互之间也是激烈的。通过集团与集团之内的相互竞争，可以显示出具有特征的集团志向性。第二是与此相关的现世主义问题。可以说，这是文化的此岸性。也就是负责任地不与日常生活现实之外的、或超越它的价值与权威发生关系。不是与那一方的彼岸，而是与这一方的此岸发生关系。第三是与时间的概念相关联的、尊重现在的态度问题。并不大担心往昔的事。也许谁也不大担心往昔的事。不过，对自己不称心的事就忘却得很快。不仅个人会忘却，而且集团也会很快地忘却，这是一种国民健忘症。另外，对未来的事也并不大担心。总之，现在还活着。这就成为“如今在此”是最重要的。简言之，上述三个问题，就是竞争的集团主义、此岸性和现在主义。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集团内部的调整装置的象征体系是怎样的呢？我想谈谈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最后我还想补充几句上述有关日本社会所具有的特征，对外时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即对外的态度。这是性质略有不同的问题。上述四个问题虽是密切联系的内在的结构，可对外又是怎么样的呢？这大概是最后的一个问题吧。

(一)

首先谈第一点，集团主义问题。我试把日本的集团原型分作两点来考虑，其一是“家”。家族主义，它是以各种形式被揭示出来的。譬如，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川岛武宜从社会法学的立场作了论述。中根千枝也从人类学的角度，以“家模型”为中心，思考过日本社会的集团主义。另一点就是“村”。考虑“村”的理想型，并把它作为一种范例来

说明日本社会的集团性。当然，“家”与“村”有些不同。

“家”的情况，除了极少例外之外，是不会把家族中某一成员撵出家族的。村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它是会把违反村规的人撵出去的。这叫做陶片驱逐^①，日本话叫做“村八分”^②。包含这种情况在内，现在一考虑到“村”的模型，就会想到“村”集团的第一个特征是集团中的一致主义。大家都希望一致起来。不仅传统的地域社会是这样，现在的企业、体育队、甚至大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的吧。整个国家都存在这种倾向。大家干同样的事，具有同样的意见，这是最理想的。

第二个特征是，由于意见的一致是理想的，所以就不希望存在少数意见。少数意见的存在，被看作是不幸的事故，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把持有这种意见的成员驱逐出集团之外。也就是“村八分”。总之，这个集团不是包含少数意见的集团，这是第二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是，集团内部结构往往通过严格的上下关系而成立。因为是上下关系，所以也可以说是“垂直”的秩序。不过，日本的“村”集团结构中也有“水平”面。在日本传统的农村里，也有像小伙子和姑娘们聚会那样的横的关系。自古以来，日本的“村”里也有“水平”的人际关系，

“村”的秩序本来是纵和横的。英国社会学家 R·P·多尔说过：日本的集团结构既不是完全“垂直”，也不是完全“水平”，而是“倾斜”的人际关系。简单地说，也就是这样

① 古希腊为防止僭主的出现，用秘密投票形式驱逐被认为是野心家的人，投票时在陶片上标明此人的记号，因而得此名。

② 全体村民对违背村规的人及其家庭实行断绝往来，以示制裁。

吧。细说的话，那就与其说是“倾斜”的，莫如说有些方面有“垂直”因素，有些方面有“水平”因素。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某种因素就相应强烈地呈现出来。平等主义容易从这种传统的“横”的结构产生出来。诚然，美国占领军曾把“自由、平等、博爱”这种时候的“平等”，当作民主主义的原理来加以强调，但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日本的集团里就没有“水平”因素，没有一种潜在的平等主义。这点恐怕是很重要的吧。再说，明治维新打破了德川时代的身分制度，朝着人际平等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其后，1945年以后，现行的宪法和民法更彻底地实行平等主义。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平等主义是渐渐推进，并不是在占领下才突然盛行起来的。就是说，第一阶段明治维新、第二阶段在占领下开始了战后的平等主义。它之所以能彻底贯彻，不仅是由于占领军强制推行的结果，而且恐怕是由于原来这方面，或者说日本的土壤早就存在平等的因素的缘故。如果不是这样解释，就不能充分说明战后日本的平等主义——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的平等主义了。特别是不能说明“平等”彻底，而“自由”不彻底的这种独特的组合。“自由、平等、博爱”中的“自由”、个人的自由方面，是与传统的集团主义完全对立的，日本社会原则上提倡“自由主义”、尊重人权，实际上是不彻底的。人们普遍认为，总的来说，战后日本的改革，只不过是美国强制推行罢了。当然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改革中真正扎根在日本社会的部分，本来就是存在这根基上的东西。总之，平等主义扎下根了。但是，诸如人权、尊重少数意见或个人自由等就没有扎下根来。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根基上没有这种东西的缘故。就博爱而言，也许这个词儿翻译得不贴切，法国革命的友爱叫做兄弟爱，这

是忠实于语源的。总之，这是横的关系。如果把它当作类似集团的团结，那么在法国革命的时候，也理应意味着法国国民的团结。如果包含这种意思，那么具体地说，就是国民的团结，在日本国这就太多了。我以为这就是日本的情况。

第四个特征就是竞争。集团主义这种倾向不仅在日本，在亚洲的许多社会里也是非常强烈的。现今假设使用个人主义的社会和集团主义的社会这种语言的话——虽然我觉得个人主义这个词儿可以作种种解释——那么个人主义倾向强烈的，大概是西欧和北美吧。就是在北美，也得数东北部，特别是新英格兰吧。其他社会大多是集团主义社会。因此，要对照集团主义社会和个人主义社会的区别，把日本社会同西欧、北美的社会作对照，就可以看到明显的区别。可是，如果把日本社会同亚洲社会作对照，恐怕区别就不明显了。那么，日本社会与其他许多亚洲国家的社会在哪些方面存在不同呢？这大概就是，今天日本的集团是激烈竞争的集团吧。首先，集团相互之间，例如日产和丰田、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之间竞争是激烈的。就是在集团内部，自己为了出人头地，就要同他人竞争，连休假也没有了。这种竞争的最单纯的形式，就是体育比赛，诸如比别人跑得快、游得快等。目的单纯而明确。另外，为达到其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或手续，有着明确的规则。日本典型的集团不论哪个，与体育比赛的情况一样，都是在某个领域里认定同一个目标，遵守特定的规则而展开竞争的。这种行为，就是支撑集团活动的主要动机。在这样的集团之间展开竞争，或正在进行着竞争。但是，并不是所有集团都热心于达到特定目的的。譬如，就以存在根据世袭身分而下定义的集团和贵族集团来说吧，一旦属于这个集团，成员们不干什么事也都可以了。贵族也不用达到任

何的目的。只要拥有贵族这个身分，就有各种好处。在身分集团里，只凭属于该集团，就值得庆幸，就有某种好处。在这样的集团之间不会引起竞争。充其量产生某种程度的妒忌。互相竞争激烈的集团，就是目标指向型集团。这样的集团，为取得竞争的胜利，其集团的行动在与目的有关方面就必须很有效率。为了提高效率，就必须量材任用，合理使用人材。因此集团内部必然产生一种能力主义。集团成员之间在能力上的竞争，就会变得激烈起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能力，不限于狭义上的工作能力，还包括善于与同事相处的能力，甚至包括在极端情况下不能发挥能力的能耐。还有量材任用的“任用”，不一定是上下关系的事，而在多数情况下，实质上是重要的岗位问题。我认为这大概就是日本的组织的微妙而有趣的地方吧。总之，身分式的集团是静止的、不活动的，相形之下，近代日本的目的指向型的典型集团是活动的、往往是进攻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的陆军和今天的企业都别无二致。再说，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会产生那种经济发展、出口汽车等情况了。而且这种活动性集团，其内部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避免妨碍集团整体的效率，早已准备好巧妙的组织结构。那就是采取整个集团负责的组织结构。即使事业失败了，也不会明确个人的责任。甚至不一定追究集团首脑，譬如公司总经理的责任。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一切都由整个公司负责。倘使在美国，公司的业绩不佳，总经理必须对股东会负责。在日本，却几乎没有这种事。不仅是公司总经理如此，就是公司职员在某些方面失败了，职员本人也不会因此而被解雇，除非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人谁能没有失败的时候，对个人来说，这种做法是值得庆幸的吧。这不是指小公司的内部情况，整个国家

都是如此。就以那场15年战争为例，日本方面，作为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应对战争负责。也就是说，所有日本人都是坏的。战争责任要由全体日本国民来负，而不是由领导人来负。所谓“一亿人总忏悔”，就是说香烟铺的老大娘和东条首相都负一亿分之一的责任。而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近于零，即等于无责任。所谓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于大家都无责任。这种思考方法在一般西方社会是不通用的。丸山真男在其《日本政治的心理与逻辑》一书中，把纽伦堡审判同东京审判进行了比较，在纽伦堡审判中，是明确应负战争责任的人的。纳粹领导人都明确地说自己负有责任。据说日本发动战争的领导人却说自己是不希望战争的，因为有一种空气朝着战争的方向移动，所以我们赞成了。——这的确令人震惊！日本的集团无责任体制，如此鲜明地表现出来，这是罕见的。这种体制之所以不起作用，是因为其对象是外国人的缘故。在德国，除了纽伦堡审判以外，还有德国人自己对战争罪犯的审判。然而在日本，除了由外国人强制执行的审判以外，日本人自己对战争罪犯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审判。日本方面不论是失败还是胜利，不论干什么事，责任都在整个集团而不在个人。日本人不仅没有自己的审判，恐怕压根儿就没有这种想法。

(二)

对于被强制组合在这样的集团的个人来说，所谓世界就是集团本身。集团或社会、或现今所在的这个人世间，也就是所谓此岸吧。日本人是否认为，所谓死就是由此岸移向彼岸呢？大多数人认为不一定如此，甚至认为彼岸实际上也是此岸具体的所属集团的延长。可以说，日本文化所定义的世界

世界观，基本上是此岸的——日常的现实的。现今也是如此。住在一个小村庄的某个家族，某人死了，死者的尸魂到哪儿去呢？一说是其灵魂暂时未定去向，飘忽之空中。譬如，许多儒学者都近于主张此说。但是，根据柳田国男的研究，典型的说法是：其灵魂到了村庄附近的山上，在那里保佑着村庄。大体上村庄有水的地方，坐落在山麓或峡谷下方的地方，从山上可以清楚地望及的。灵魂不是永远呆在山上，而是暂时呆在那里。它借特定的机会才回到村里来。村庄里似乎有各种风俗习惯，总之，它是在适当的机会才回来的。这谁都熟悉的机会，就是夏季的盂兰盆节。灵魂归来的地方，绝对不会是邻村，一定是回到自己的村庄，而且一定是回到自己的家中。也就是说，其灵魂生前所属的集团属性，即使死后也不会改变。日本人的集团属性比死还顽强。也许可以说，死后的世界，就是集团的延长。说到底，就是没有与此岸断绝关系的独立的彼岸。本来的现实就只有村庄本身。家族、村庄、此岸，这些就是唯一的最终的现实。

这种世界观的此岸性意味着什么呢？佛教传入的时候，它阻挠佛教向大众渗透。尽管如此，如果佛教深入到民众中，佛教本身也将不断地向现世利益、此岸的效用的方向变化。如果将这种从佛教夺去其彼岸性的变化叫做“世俗化”，那么德川时代的佛教世俗化是彻底的。德川幕府将佛教寺院行政制度化，并决定谁都必须是佛教徒。这一时代，佛教是同政治权力相结合，同时也是在思想上彻底世俗化。这个时代的政治伦理的价值体系，或文学的艺术的表现，从17世纪起就已经成为世俗的东西了。儒教伦理是此岸性的。文学作品和绘画就甚少佛教的宗教的“主题”。那时候，亚洲大部分地域的文化——虽然中国的情况存在一些困难的问

题——是佛教文化。在欧洲，教会是排斥异己的。在日本就没有产生导致引起排他性行为那种程度的、教条式的宗教体系。大概是由于文化本身已经世俗化了的缘故吧。这样，早就表现出来的世俗文化，大概就是日本实用的技术主义（从二宫尊德的“方法”到战后日本的信仰国民生产总值）、享乐主义（从《好色一代男》^①到周刊杂志）以及美的装饰主义（从琳派^②的绘画工艺到日本菜肴的盛盘）的共同背景吧。另一方面，同样的背景就是德川时代以后的日本，除了特殊的情况（三浦梅园和西田几多郎）之外，没有产生过抽象的概括性的形而上学的体系，无疑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在个人被高度组合在集团内的条件下，个人要同超越其所属集团，具体地说要同超越家、村、藩和国家的权威或价值而发生关系，是很困难的。反之，由于没有这种绝对的价值，个人对集团的利益是不能主张自我的。就是说，这种高度的组合是可以维持下来的。这犹如鸡和蛋的关系，姑且不论谁先谁后，总之如上所述，日本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超越集团的价值，决不能成为支配性的。明治以后的统治阶级企图将天皇绝对化，但是，天皇正是国民这种集团的象征，天皇的绝对化，这岂止是超越集团的价值（譬如，儒教的“天”、基督教的“上帝”）的绝对化，而且正是集团本身的绝对化。

（三）

超越的价值所束缚的文化向何处去？在那里很难引起宗

① 《好色一代男》是井原西鹤（1642年—1693年）的代表作，描写一个好色汉继承其父的遗产，过起富豪的放荡生活。

② 琳派，即江户时代的宗达——光琳派，以绘装饰画为主。

教战争吧。另外，为了否定社会现状，需要独立于现状的价值，在没有这种价值的地方，就不会出现“乌托邦”思想。也不会发生支持“乌托邦”思想的革命。作为个人的行为模式，不自觉的机会主义、随大流主义——往往被称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将是最典型的。从艺术表现来看，强调的是部分的感觉敏锐，而不是全体的秩序。美的价值也不超越个别的、具体的状况。没有脱离细节只顾全体秩序的原理。这种强调部分主义的典型例子，譬如平安朝的假名物语和17世纪初的诸侯宅邸的平面图。平安朝物语的整个故事结构是不清晰的，并不是有始有终像建筑式的东西。譬如《宇津保物语》，基本上是由许多短篇衍生而自然形成完整的故事的。这种形式的长篇小说，没有一个完整的形象，它写一个人从孩提起逐渐长大，体验了许多事情，最后直到死亡。独立性很强的各篇并列一起，归纳而形成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显然，这是先有部分然后才走向全体。并不是先有全体，然后再撰写部分。德川初期诸侯宅邸的平面图——与寺院等建筑不同，大概是没有受到中国纪念碑式的建筑模式的影响——岂止不是左右对称，而且复杂得出奇。显然，这不是先考虑整个建筑空间的形状，然后细分其空间而建造的，无疑是先从建造房屋开始，当建造停顿下来时就形成了当初没有料想到的全体的形状。总之，这是增建的精神。一般地说，我们之所以增建，是因为没有钱一口气建成。但是诸侯宅邸，恐怕就不是因为钱的问题，毋宁说是空间部分和全体的关系，反映出一种基本的看法、一种哲学吧。其哲学就是从部分出发，自然而然地达到全体。许多房间的连续，就形成全体。房屋建乏了就结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好建到哪里才告终结的。现在还保存着许多德川初期的诸侯宅邸的平面

图，这种特征可以当作一般化来考虑。它是尊重部分主义，这是日本艺术的一种特征，进一步说，是日本人对空间认识的一种特征。

与这种空间概念存在平行关系的，就是“现在”并列相继而起的象征时间的概念。从房屋到房屋连续下去的就是宅邸，从今天、现在到另一个今天、现在，连续下去就是历史的时间。就是这个意义上的现在主义。在那里，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结。以神话的水平来说，是缺乏创世期神话和终结论。持反对意见的人也许会说，《古事记》里不是有创世期吗？不过，那是在外国直接影响下写出来的。中国、朝鲜都有创世期的故事，日本也相对地必须创造出来，所以就创造了。所以这大概与日本土著的对时间的基本看法没有太深的关系吧。在日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历史就开始了，也没有止境，只有不断地延续到现在。这就是我所说的“现在主义”。不使用过了夜的钱。明天刮明天的风。人之所以变得悲观，是因为担心明天的事。倘使不考虑明天的事，大概就可以乐观地度过今天了。譬如，东京的电车拥挤不堪。不论早晨、白天或晚上都拥挤不堪。但是，许多人在拥挤的电车里却挂着一副比较明朗的面孔。不然，就是一张张安稳的睡脸，一张张认真埋头阅读连环漫画的脸。这样明朗的脸、打瞌睡、埋头阅读连环漫画的情景，在我曾经呆过的其他大城市，如巴黎、维也纳、伦敦、纽约的地铁里，是极其罕见的。这大概与“明天刮明天的风”的哲学有关吧。1941年12月8日的东京市民的表情，显得十分愉快。数年后发生什么事了呢？这是从所周知的。进入80年代，美国军国主义与日本国的勾结越发加深了。尽管如此，日本人的脸之所以明朗，是因为他们可以不用思考数年后可能发生什么事而生活

着的缘故。

充分反映了这种时间概念的，大概就是从12世纪开始，到了13—14世纪非常流行的画卷。画卷是把细长条的画卷成圆轴，在展览会上只能看到一部分。想一览全画卷毕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非常长，看到某部分的时候，别的部分就变得很遥远，看不见了。这本来就是放在自己的面前，从右看起，一点点地展开，边看边卷，看完的时候，画也卷好了。此后还看的话，因为还没有展开，就看不见了。故事与时间的经过是一起前进的，插图也按照顺序向前赶，这样一来，看画卷的人就变成脱离故事的前后，只是不断地看到现在的场面。为了理解或评价现在的状况，基本上不需要知道以前的情况和以后的发展。这种情景与欧洲中世纪的“原始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将基督受难这种经过漫长时间所发生的事件描绘在一张画面上，这种表现时间经过的空间，在日本是不多见的。日本的画卷是典型的。大概只有现在才成为问题吧。可以说，这个现在是超越预测，不断地出现的。因为只打开画卷来看的话，是不会知道后面将出现什么画的。某种东西总会突然地出现。而且在下一个场面出现之前，不会太慢就必须迅速作出反应。也许会有这样的想法：画卷的世界，就是这样向着难以预测的情况变化作出迅速的连续的反应。

情况发生变化的，不仅是画卷的世界，现实的世界也是如此。在日本，情况不是“改变”，而是“变化”。因此面对预料不到的变化，就是说面对突然出现的现状，迅速作出反应的技术——心理的技术是发达的。其实也可以认为这种情况是集中表现在画卷的时间概念上。还有，这种情况的反映，不限于画卷。例如，就象今天的日本外交一样。第二次